



FGS

Frontiers of Global Sinology

FGS, Vol. 1, No. 1, 2026, pp.30-46.

Print ISSN: 3106-5503; Online ISSN: 3106-551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g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gs260104stcci>



华风南流：越南汉文赋谏论

阮友寿 (Nguyen Huu Tho), 刘培 (Liu Pei)

摘要：古代的越南有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被划入中国版图，是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五代时期开始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然仍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越南文化的各方面深受中国影响，各种源于中国的文学体裁陆续南传并在越南继续衍生，其中包括辞赋。辞赋在越南深受重视，在科举考试中扮演着升降人才的角色。由于长期与科考直接牵连，导致场屋文体经世致用的风格渗透到文艺赋的写作并成为越南赋家普遍的创作理念。除此之外，辞赋传到越南也“入乡随俗”，形成了本土特色，主要体现在咏史类题材。

关键词：越南文学；辞赋；域外汉学；文化外传

作者简介：阮友寿，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辞赋学、域外汉学、越南古代文学，电邮：ng.huutho@outlook.com。刘培（通讯作者），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辞赋学，电邮：lpdvd@163.com。

Title: The Southward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al Influence: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of Vietnamese Fu Written in Han Script

Abstract: For over a millennium, ancient Vietnam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inese dynastic map, functioning as an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Beginning in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Vietnam achieved independence and established its own statehood, yet continued to maintain a suzerain-vass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gainst this historical backdrop, various facets of Vietnamese culture were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China; numerous literary genres of Chinese

origin were successively transmitted southward and continued to evolve within Vietnam, including the Ci-Fu (rhapsody). The Fu genre was highly esteemed in Vietnam,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the sel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alent with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Due to this long-standing and direct association with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he pragmatic and utilitarian style typical of “examination hall” literature permeated the composition of artistic Fu, establishing the ideal of jingshi zhiyong (statecraf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s a prevalent creative philosophy among Vietnamese Fu writers. Furthermore, the transmission of Fu to Vietnam involved a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 resul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distinct indigenous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most prominently manifested in works exploring historical themes.

Keywords: Vietnamese Literature; Ci-Fu; Extraterritorial Sinology; Cultural Transmission

Author Biographies: **Nguyen Huu Tho**,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Research: Fu Studies, Extraterritorial Sinology, Ancient Vietnamese Literature. E-mail: ng.huutho@outlook.com. **Liu Pei** (Corresponding Author), Ph.D., Professor, Ph.D. Supervisor, and Postdoctoral Supervisor at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Research: Tang and Song Literature, Fu Studies. E-mail: lpdvd@163.com.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在红河流域设立象郡（其领土主要包括现代越南的北部和中部以北的一带地区），越南开始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大地分裂瓦解，各地势力纷纷崛起。公元 938 年，安南豪杰吴权击退中国割据政权南汉的侵略，从此摆脱中国的统治。这 1100 多年的时间被越南史学界称为“北属时期”。其间，中华文化与汉字通过多种渠道传入越南，包括辞赋在内的各种文学体裁均南传并成为越南文学的一部分。

第一篇由越南人写的赋作在越南文学史上出现得比较早，为唐代爱州（今越南中北部地区）人姜公辅（780-805 年）的应试之作《白云照春海赋》。越南古籍的散佚情况颇为严重，关于辞赋的资料大多只有陈朝（1225-1400 年）以后的文献得以存留，其间之前的则无处可寻。姜氏此赋也因被记录于宋代文学总集《文苑英华》而得以传世，在越南现存古籍中则不见其踪影。

李朝时期（1009-1225 年），史书载有关于辞赋创作的活动。《越史略》载太宗明道二年（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王幸武宁州松山寺，见其颓殿中有石柱欹压，上慨然有重修之意，石柱忽然复正，因命儒臣作赋，以纪其异”（不详，民国 25 年，p. 31）。从这条记载可得知两个重要的信息：其一，李朝初期儒术已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朝内已有儒士做官；其二，是时辞赋创作仍围绕佛教的主题，这跟当时统治者崇佛仰佛的政策不无关系。可惜，李朝现存文献寥若晨星，纪录松山寺事件的赋作亦不存留，无法知道其面貌如何。

后黎（1428-1788 年）至阮（1802-1945 年）历代王朝，大量越南赋集问世。据刘春银、王小盾等（2002）编纂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其大多为总集，数量达 55 种之多。越南学者潘秋云来中国复旦大学留学，由于能接触到的文献资源有限，她于 2010 年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越南汉文赋对中国赋的借鉴与其创造》中指出仅搜得 135 篇，此数量对越南赋史来说只是冰山一角。最可靠的数据应从南京大学张伯伟，其主持的“国外辞赋文献集成与研究”项目对越南辞赋文献数量进行统计，得知现存上千篇。张先生（2024，p. 142）指出，“越南所存的赋集虽多，但大多数都是与科举相关的读物，往往乏善可陈”。此话不无道理，然抛开后期呆板的科举读物，越南汉文赋库中仍有不少充满艺术及文学价值的作品，主要集中在陈黎之际。从现存文献来看，越南汉文赋的基本面貌主要体现以下三个特点：

一、赋兼才学：辞赋在科举中的地位

科举制度是古代先进的中华文化的代表，随着汉文化向域外传播的过程也被周边各国接纳、模拟、运用，其中包括越南。中国科举考试始于隋代，经唐宋二代日益得以完善。唐代科举试杂文（箴、铭、论、表之类），唐人以赋取士，始于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徐松，1984, p. 70）。以明朝以八股文代赋为界，中途虽有不少罢赋之举，然试赋制度在科考史上一直都是主流。

越南独立之时，当对应中国五代末叶宋代初期，中国科举制度已基本完善。丁（969-980年）、前黎（980-1009年）两个开国王朝由于国祚简短、社会秩序尚未稳定，礼乐教育仍未普及。越南从李朝（1010-1225年）才开始引进科举制度，于仁宗太宁四年（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首次开科取士。李代主张儒释道三教并尊，科举制度以试三教为图形，试法仍属草创，“或试儒学士人，或试吏员僧道，诗书文艺、书算刑律、簿头三教之类，试法不一，科名亦未之闻”（武钦璘）。越南自陈朝（1225-1400年）开始设试赋科目，从此赋成为越南科举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虽然考试内容每一代都有所变化，但试赋制度却一直保持下来。”（孙福轩，2011, p. 151）

陈朝是完善越南以儒学教育为核心的科举制度的王朝，而从具体上看，其试法多有受宋元制度影响的地方。越史载英宗兴隆十二年（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试天下士人，“其试法先以《医国篇》（不详）、《穆太子传》（应作“天子”）暗写汰冗。次则经疑、经义并诗题用《王度宽猛》，诗律用《才难射雉》，赋题用《帝德好生洽于民心》八韵体。三场诏、制、表。四场对策。”（吴士连，2015, pp. 323-324）是时元朝尚未恢复科举，而此试法则多有模仿南宋制度的痕迹，经义与诗赋并设，最后一场试策以定高下¹。

这一时期，不仅试赋成为选拔人才的工具，且献赋之风尚在盛行。莫挺之（1272-1346）本为此科的第一名，进朝面圣时英宗见其容貌丑陋，不欲与之状元，廷之便作《玉井莲赋》以献，甚得英宗欣赏。其赋取材自韩愈《古意》诗“太华峰顶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结合周敦颐《爱莲说》，以洁身自好、不同流俗的莲花自喻。赋中借用大量中华典故，展露出作者出乎常人的汉学才华，成功改变了帝王以貌取人的偏见。今录其一段如下：

客一见之，中心郁郁。乃拂十样之笺，泚五色之笔，以为歌曰：“架水晶兮为宫，凿琉璃兮为户；碎玻璃兮为泥，洒明珠兮为露。香馥郁兮层霄，帝闻风兮女慕；桂子冷兮无香，素娥纷兮女妬。采瑶草兮芳洲，望美人兮湘浦。蹇何为兮中流，盍将返兮故宇？岂溷落兮无容，叹婵娟兮多误。苟予柄之不阿，果何伤乎风雨？恐芳红兮摇落，美人来兮岁暮。”

道士闻而叹曰：“子何为哀且怨也？独不见凤凰池上之紫薇，白玉堂前之红药。冀地位之清高，藹声名之昭灼。彼皆见贵于圣明之朝，子何乎骚人之国？”

于是有感斯言，起敬起慕。哦诚斋亭上之诗，赓昌黎峰头之句。叫阖闾以披心，敬献玉井莲之赋。²

¹ 宋廷南迁后，高宗于建炎二年（1128）定科举试法：“第一场诗赋各一首，习经义者本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并论一道；第三场并策三道。”载〔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五十六《志第一百九·选举二》（1985, p. 3625）。

² 文中所引的越南辞赋均转自《群贤赋集》，下文不再一一说明。〔越〕黄萃夫编《群贤赋集》，河内：汉喃研究院藏本，编号 A.575。

收录莫氏此赋的各种越南诗文集均标明其为“御制”，可知献赋在这一时期是被官方认可的活动，也是科举教育中的一个环节。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八《陈纪·顺宗皇帝》载光泰九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1396）更新试法，“罢暗写古文法。第一场用本经义一篇，有破题接语，小讲原题，大讲缴结，五百字以上。第二场用诗一篇，用唐律赋一篇，用古体，或骚或选，亦五百字以上。第三场诏一篇，用古体，制一篇，表一篇，用唐体四六。第四场策一篇，用经史时务中出题，一千字以上。”（吴士连，2015, p. 412）这一改变是为了跟随元朝的复古之风。

越南阮朝科考专著《国朝乡科录》载：“夫试举人，及前年乡，后年会，文体依元制，用四场文式，则又至顺尊（宗）辰（时）始见。”（高春育，p. 6）元廷长时间停止科举考试后，于仁宗延祐二年（1315）复科。元代科举制度有种族歧视的色彩，统治者将天下人分成蒙古、色目、汉、南四等，前两者乃社会上等人，在科举中享受优待。据《元史》卷八十一载，元廷给汉、南人设计的考试程式分三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限五百字以上；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限一千字以上（宋濂，1976, p. 2019）。对照两国考试程式，可见顺宗朝试例多有模仿元制之处。从地理位置来看，陈氏大越国与大元南陲接壤。从文化交流而言，越人更多的是受中原的汉、南人文化影响。所以，陈朝引进汉、南人考试程式的举措不言而喻。问题是，纵观陈代朝廷一直使用宋式八韵律体作为考试赋体，为何到末年却“依元制”变律为古？要知道此时元朝早已覆灭，复古之风已不复存，且明制亦不考赋。

对于这个疑点，笔者认为其原因除了越人对赋的崇尚外，更多的是与当权人的思想有关。是时，入内辅政太师黎季犛掌握大权，顺宗只不过虚位一席而已，朝廷所有政策均出自季犛之手，包括科举试例。黎氏后来改姓胡，篡位自立，是灭陈之贼。抛开历史因素不谈，胡季犛的确称得上越南 14 世纪末 15 世纪初颇负盛名的政治家。

在思想方面，胡季犛崇尚儒术，曾将《诗经》演歌成国音喃字（越南人从汉字的基础上创造的本土方块文字），令女师教后妃、宫人学习。《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载陈顺宗光泰八年（1395）“季犛因编《无逸》篇译为国语以教官家，有命则称辅政该教皇帝”（潘清简，pp. 22-23）。在翻译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胡氏总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进行注疏，而不拘于诸子集传。胡季犛还著有《明道》十四篇，论述颇为奇异，认为周公是先圣，孔子是先师，文庙以周公正座南面，孔子偏坐西面；论著名儒者，以韩愈为盗儒，谓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学博而才疏，不切事情，而务为剽窃。这些观点为当时及后世儒士所非议。越南学者黎明国（Lê Minh Quốc, 2004, pp. 90-96）认为胡氏本意推翻程朱理学，回归原始的儒术，并建立带有越南特色的儒家思想，然其观念与当时新地主阶层的权利相矛盾，故受排斥。

在教育方面，胡季犛不管在架空陈帝还是自立期间都特别重视科举与教学，推行多种改革。胡氏厌恶毫无营养的抄写经典考试方式，故在光泰九年试例中罢暗写古文，越南四场文体自此始定。

“古体”是元代科举中盛行的概念，萌芽于延祐复科之前士大夫阶级中的复古赋论。元廷恢复科举后，以祝尧《古赋辩体》为代表，“古体”概念逐渐定形。祝氏主张“祖骚宗汉”，认为“古今言赋，自骚之外，咸以两汉为古，已非魏晋以还所及”（踪凡、郭英德，2017, p. 135），将“楚辞体”和“两汉体”尊为“古体”。祝尧这种跨时代的“认祖归宗”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与胡季犛的思想产生共

鸣。因为胡氏也有一套类似的华夷辨，认为越国的礼仪制度是承汉袭唐的华夏正统，最明显体现在他的《答北人问安南风俗》中，其诗云：“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玉瓮开新酒，金刀斫细鳞。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船春”（于在照，2014, p. 51）。如此一看，说胡季犛基于自己的儒学观念对现行的考试程式进行改革，以古体考举人，并不是没有道理。

在外交方面，胡季犛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反明态度。自从还在当陈家臣下的时候，胡季犛已经料到与明人发生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事。光泰十年（1377），季犛逼顺宗迁都至清化府（今清化省），曰西都。新城建立在极为险要的位置，有固守之势。胡氏迁都，除了易于控制官家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为明越之战做准备。季犛后来篡位，自立胡朝，改国号曰大虞。其在位期间，大力振兴军事、铸造武器、建设防守工程，一切为战事做准备。又多次与明人发生边境冲突，这也是明廷发兵攻打大虞的原因之一。从这点来看，岂不是季犛与明人不和，故不愿用其制度乎？《明史》卷六十九载，明代初期“诸生应试之文，通谓之举业。四书义一道，二百字以上。经义一道，三百字以上。取书旨明皙而已，不尚华采也”（张廷玉，1974, p. 1689），科举重经史考试，用八股文代古人为言，试赋已被废除。这与越南长期使用的考试程式区别甚大，所以胡季犛为了别于明人而选择“依元制”，是可以理解的事。

1427年，蓝山义军的领袖黎利经过长达十年的斗争，成功击退明军，结束二十一年郡县时期。1428年黎利称帝，建立新的王朝（史称后黎朝），开启越南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后黎朝初期的科举制度多袭陈制，不仿明而仍以赋为考试内容。《国朝乡科录·天南前朝乡会科次试法略编》载黎圣宗光顺三年（明英宗顺天六年，1462）试法：“先暗写汰冗一科。第一场四书经义共五道。第二场制、诏、表用古体四六。第三场诗用唐律，赋用古体，骚、选同三百字以上。第四场策一道，问经史辰务出题限一千字以上”（高春育，p. 19）。洪德三年（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圣宗更新试例，第一场四书八题，第二场诏、制、表各三题，第三场诗赋各二题（赋用李白体），第四场策问一道（吴士连，2015, pp. 652-653）。洪德考试程式除了罢暗写汰冗和赋改古体为李白体外，与前代试法基本一致。“李白体”是黎圣宗朝使用的一种考试赋体，一直被沿用到黎氏王朝的后期（黎中兴）。关于这种赋体，将在其他论著中进行详细考辨。

阮朝统一国家，结束黎中兴至西山朝二百多年分割的局面。阮世祖大力振兴教育，“立文庙，兴学校，置科举，合南北之学术而一之”¹。世祖嘉隆六年（清仁宗嘉庆十二年，1807）试法曰“第一场制义，经五题、传一题，士人行文专治一经或兼治亦咱（听）。第二场诏、制、表各一道。第三场唐律诗一首、八韵体赋一篇。第四场策问一道”（高春育，p. 15）。可见阮朝初期的考试程式在借鉴清廷试法考八股制义的同时，还沿袭前代制度以诗赋取士。至翼宗朝，情况有所改变。嗣德十一年（清文宗咸丰八年，1858）乡科复用圣祖明命十五年（1834）定的三场试法，“第一制义。第二诏、表、论。第三场文策。其诗赋停罢，至会试用之”（高春育，p. 50），直至嗣德二十九年（1876）复考诗赋。阮朝虽有短暂一段时间罢试赋，但也只是乡科停考，会试例依旧不变，可以说这只是朝廷减轻繁杂的考试程式的举措而已。直到越南沦为法国半殖民地，阮氏朝廷实行西、汉双语的考试新制，试诗赋制度才彻底被废除。

总而言之，越南自从将儒学教育定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开始，一直设有“赋”目并视之为重要的考试内容。越南人是这样评价赋在科考中的地位：“会试四场文策之外，重在第三场诗赋。盖诗赋

¹ [越] 章民《论越南百年来学术之变迁》，河内：《南风杂志》，1917年第5期。转自梁氏海云（2024, p. 77）。

中试，方得入对四场以取大科。使其未中大科，而预中四场，一科谓之一中，诸贡士应吏部之选，多中者在先，少中者在后，无中者只可以年授课职……当辰（时）学者既中乡科，始习四六诗赋，而尤以赋为难。或曰：‘进士，天榜也。就使未有天命，而三场累中，亦可以肥妻荫子。’故以诗赋为重。”（范廷琥，p. 162）此话虽为范廷琥对黎朝科考的评论，但同时也是越南科举制度的写实。

越南历代封建王朝为何在科考中一直保持试赋一目？学者陈文（2006, p. 75）认为其原因有二：一是越南人崇尚汉文诗赋，其修养之深浅是衡量一个人的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二是越南一直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越南使臣的汉文诗赋修养是中越官员交流的润滑剂，也是越南使臣跟其他赴华出使的国家的使臣交往的工具，而越南使臣的身份大多为状元，故考赋是培养外交人员的重要环节¹。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越南人受中国人重赋的思想影响。赋有“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特征，善赋者有铺张之才，能在宏大的体制中驰骋想象，“体国经野”。故自《文选》起，中国诗文总集就有将赋置为首卷的习惯，体现了中国人对赋的崇尚。谢桃坊（2021, p. 35）指出，“宋代继唐代将诗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诗体因而较为尊贵，以为它能充分体现儒家的诗教，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虽然论的是诗，然于赋亦是如此。这种思想随着汉文化的传播也被越南人接纳，赋受到文人们的尊崇，统治者也视赋为广播儒家学术的有益工具而给予其在科举中很高的地位。所以说在越南赋兼才学，是人们步入仕途的重要门槛。

二、儒风泛起：经世致用的创作理念

儒家学术在越南的广泛流传证明了汉文化在域外的影响之深。自北属时期，中原朝廷的地方官员在交趾所实施的礼乐教育政策已将儒家思想扎根于此地。锡光、任延、士燮等历代太守有推广华风之功，为越南人所崇拜。犹如《越南历史》一书所载：“自东汉以后，特别是公元二世纪末叶，汉族的士大夫到交趾的越来越多。儒教比过去更得到普遍传播。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春秋》等书，在封建政权和士大夫开办的学校里普遍讲授。”（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1977, p. 75）。到唐代，“多种迹象表明，当时在唐廷的推动下，安南一些村社也设立了学校，儒家的经典得到了广泛研习”（Trần Nghĩa, 2000, p. 124），科举制度的普及也成为了促进汉文化在安南地区传播的得力工具。

进入自主时期，越南受五代及宋朝文化的影响，儒释道三教并尊，其中最重佛教（尤其是禅宗）。丁、前黎二代，僧侣甚至成为封建朝廷的重要成员。如宋太宗雍熙四年（987）遣李觉出使至越，黎大行皇帝命法师杜法顺假为江令迎宋使的故事（吴士连，2015, p. 133）。李朝是越南佛教的鼎盛时期，佛教被尊为国教，时有“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吴士连，2015, p. 149）的现象。陈朝佛教虽稍有逊色于李，然历代帝王仍笃信佛道，被后世史家讽刺曰“以堂堂之天子而为竹林之禅，以天子为大夫，以妃嫔为丘尼，以王主为僧众”²。由此可见后黎朝之前越南崇佛之风大为盛行。

在这种以佛教为主流的氛围下，越南独立初期的儒教在社会中仍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能与佛教颉颃。如丁、前黎两朝著名僧统匡越大师吴真流，黎廷饯别宋使李觉时，与之作曲酬唱（本应为儒臣的工作），可见当时其社会地位之高。像吴氏这种级别的僧侣，年少时也有过一段从学儒术的时间，后来才皈依佛门的。或李陈时期科举考试已经成为选拔人才的工具，其试例要求业举者儒释二道兼通，《历朝宪章类志》载：“李陈二代，皆尊尚释道，故一辰（时）取士必欲兼通贰氏，虽正道异端，

¹ 参阅陈文（2006）：“科举在越南的移植与本土化——越南后黎朝科举制度研究”，暨南大学。

² [越]黎嵩撰《越鉴通考总论》，河内：汉喃研究院藏本，编号VHv.2139。转自郑永常（1987, p. 213）。

并崇无别，而士之应是举者，非博洽该识，则亦不能入选也。”（潘辉注，p. 7）时间越往后，儒家思想越来越受重视。上文所讲胡季犛撰写儒术论著、以儒家思想教育官家及后宫等事，可见陈末时期重儒教的一斑景象。

陈朝末叶儒教的地位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后黎朝则直接将之尊上主流。黎太祖深刻了解儒家思想对国家解放事业的重要性，故在其起义万重艰难之际，仍收留阮廌、李子晋、阮梦荀、陈舜俞等前朝遗臣，让他们负责拟稿文章的工作。因此才有阮廌作书谕义安、顺化、西都、东都诸城中的明军，“示以祸福，不战而降”（吴士连，2015, p. 458）之事。行政用仁义，以好生为德是黎太祖所推崇的治国之法，故其放回十万败兵成为文人传颂的佳话。这除了其自身修养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受身边的儒士谏臣所影响，特别是阮廌，如其《贺归蓝山》诗云：“权谋本是用除奸，仁义维持国世安。台阁有人儒席暖，边陲无事柳营闲。”

独立后，黎朝历代君主依旧重用儒臣，以儒家思想为建国的架构，且帝王本身亦专心投入儒家学说研习工作中。“太祖立国之初，首兴学校，祠孔子以太牢，其崇重至矣”（吴士连，2015, p. 525），对孔子及儒家学说极为重视，为后黎朝独尊儒术的政策奠定了基础。经太宗、仁宗、圣宗历朝，崇儒的风气日益浓厚。太宗在位期间，“定制度，颁经籍。制礼作乐，明政慎刑。比及数年，典章文物，粲然大备，海内丕变”（吴士连，2015, p. 559）。仁宗则“尊礼大臣，崇尚儒术。察迕言，纳忠谏，勤政事，谨赏罚。重农务本，亲民如伤”（吴士连，2015, p. 591）。这一时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学校与教育制度发展到巅峰。在学校中，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文献通考》等儒家经典皆为主要讲学教材。科举考试以儒典出题，以治乱为问。圣宗朝定保结试例，规定“其人实有德行者，方许上数应试。其不孝、不睦、不义、乱伦，及教唆之类，虽有学问词章，不许入试”（吴士连，2015, p. 601），强调应试者须遵守儒家“先道德而后文章”的道德伦理。

在越南，儒学与科举是不可分开的亲近关系，而越南科举则多方面深受中华制度的影响。学者孙福轩（2011, p. 153）指出：“中国古代的科举试赋，缘于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审美特征和历代统治者‘崇论宏议、创业垂统’的政治需求，在创作上往往表现出恢廓声势、张皇其辞的博大气象以及欲讽反劝、雍容揄扬的颂美品格，‘经’题赋成为历代科举试赋的主体内容。”中国科举试赋的这些因素在越南表现得淋漓尽致，越南试赋内容也呈现出以经史为题、以治乱为论的特点。试赋题材多采自中国古代经传史籍，主要涉及王道仁政、明君忠臣、颂扬圣贤、歌唱太平等内容。

以下参看黎太宗大宝三年（1442）壬戌科榜眼阮维则的试题《春台赋》，其辞曰：

泰和氤氲，块北无垠。乾坤清兮莹玉，宇宙郁兮阳春。絜太平之气象，羌独难于名言。揭春台以为喻，善形容于云云。

是台也，积累有由，经营莫测。高大难仿其规模，延袤不知其南北。妙化工之自然，羌不费于民力。与天地同大兮不能阶，载物无疆兮非有迹。风雨不能飘摇，工师难于绳墨。同荡荡之尧天，并巍巍之舜德。绵万祀以贞固，与乾坤而罔极。顾諟其间，万物并育。洪纤高下，飞潜动植。安其所而不侵，乱遂其生而不夭阏。皞皞熙熙，皆乐其乐。鼓舞乎泰和之天，优游乎仁寿之域。盖盛德于春融，熙皇仁于化日。普天率土，咸被其泽。融融泄泄，出作入息。诚有似乎登台，谅不知而不识。究其所由，本乎君德。致中和于两间，为生民而造福。

想其辰当上古，淳风未漓。乃继天而出治，妙燮理之化机。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德

洽仁浹，人恬物熙。想春台于此辰，羌荡荡而巍巍。至若唐虞之辰，万邦作义。黎民洽好生之德，四方形风动之美。于变辰雍，品物咸遂。夏禹致咸若之效，有商臻嘉靖之治。彼万民之咸和，由文王之德致。想春台于此辰，并覆载于天地。陶海宇于玉烛，盖一团之和气。奈何春秋风雨，七雄斩刈。当此之辰，兹台将坠。暨夫与民休息，海内富庶。米斗三钱，外户不闭。讫虽底于小康，奈未臻于极治。想春台于此辰，安能为生民之庇？

寥寥千载，治道无闻。谅天意之有在，羌有待夫圣君。猗欤修哉！高皇驭宇，一视同仁。培王业于不拔，与万物以为春。大荫尧天之庇，日跻汤德之新。天地覆载，血气尊亲。行仁义以致太平，开寿域以圉生民。

钦惟皇上，继志述事。肯构肯堂，陶成庶汇。扇万国之仁气，致中和于两际。凡有形于两间，皆鼓舞乎和气。生者安其生，遂者乐其遂。四辰一春，乾坤光霁。诚真元泰和之会，仅见于今日。而春台之事，夙掩于前世者也。

“春台”出自《道德经》“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虽本为道家所提，然“春台”这一事项一直被儒家用来比喻太平盛世中百姓安居乐业、怡然自得的景象。赋文化用大量中华经典中的人与事，议论缜密，给予春台具体的定义，即本由君德被泽天下、为生民造福而建立起的仁政制度，其不费民力而仍能与天地同大、载物无疆。赋中指出尧、舜、禹、汤、文王以德为政，天下太平，故春台覆载于天地。到春秋时期，七雄争霸，天下不复安宁，春台亦因之而不再为生民之庇。幸有汉高祖行仁政以致太平，天下万民才能重新被春台之泽。赋的结尾赞颂当朝皇帝（黎太宗）继上古圣贤之志，使百姓得以安乐，四辰一春，乾坤光霁，而春台之事已是前世佳话，不再能与今天的太平等量齐观。这是一篇典型的歌功颂德考试赋。

在统治阶层崇尚儒术的氛围下，加上科举考试的广泛流行，以经史为材成为越南辞赋的特点，这种作风不仅限于场屋赋，而且还渗透到文艺赋中，使辞赋创作表现出浓厚的经世致用情怀。越南文人作赋，或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颂美盛君、讽喻仁政，或为了彰显自身修养而言志诵理。其取材来源可以归结为两个对象：一是经、一是史。

越南辞赋取材于经者，可谓诸经兼备。后黎朝李子晋的《大宝赋》取材自《周易·系辞》篇“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此赋从《易》之大意出发，引用大量典故如“富有四海之天禄兮，尊为天子之至贵”句源于《虞书·大禹谟》“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与天地而同德兮”“与日月而并明”二句来自《周易·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泰阶平而玉烛调兮”句分别转自扬雄《长杨赋》“是以玉衡正而泰阶平也”及《尔雅·释天》“四时和谓之玉烛”；等等。赋文讲述王者居大宝之位，以仁守之，将象征政权的“大宝”转化为道德聚合体。居尊位者近忠远佞、爱贤佑能，唯圣人能之。其中间一段曰：

信兹宝之为宝兮，非常人之能识；道德以之为纆籍兮，礼义以之为文飨。坚于忠良之骨鯁兮，瑕于谀佞之乱德；明于缉熙之琢磨兮，暗于嫌疑之疵隙。必须敦谨而恭敬兮，必赖臣邻之笃弼。巍巍乎中天下而居尊兮，荡荡乎首庶物而作极。奸雄之所不敢觊觎兮，庸懦之所不眙愕。惟圣人能宝其宝兮，恐负荷之弗胜。

篇末感慨黎太祖拯溺救焚、教化育民之恩，称赞其遵行前世盛王守宝之德，以仁立国。在太祖的统治下，天下安宁、四方来朝，是一个太平盛世的开端。将越南九五之位与天命论相结合，将中原儒学价值观移植于本土政治论述，宣告其作为独立国家的正统性。这是开国之际典型的政教歌颂一类赋作：

伊皇朝之启运兮，务立国之以仁。軫生灵于涂炭兮，兴拯溺而救焚。化兵革为仁寿兮，陶万宁于一春。既所宝之惟贤兮，亦爱物而仁民。上克享于天心兮，下允叶于神人。罄幅员以戴仰兮，诚悦服而来宾。于维我西粤之大宝兮，猗天命其永新。

李子晋又有《文王囿赋》，化用《孟子·梁惠王》篇文王有囿七十里，民尚以为小；齐宣王有囿四十里，民犹以为大的故事。此赋用典密集、意蕴深厚，继承孟子的政治哲学框架，赞美“与民同乐”的文王囿背后所蕴藏的仁政理念。赋文借用一些《诗经》的对象如“灵沼”“灵台”“白鸟”“麋鹿”（《大雅·灵台》）来书写万物同乐的文王囿，其实是周民在文王的仁政下所享受的太平景象。写文王圣德则化用《周书·无逸》篇中周公赞颂文王之言：“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赋文不像《孟子》那样将文王囿与宣王囿进行对比，只借用“此率兽而食人”之意，转而直接批判后世帝王沉迷享乐，徒虚美之薰心而纵一己之荒淫的行为。

驱予车以行迈兮，指岐周之故京；历丰邑之膺原兮，览西伯之仪型。灵沼坳以扬尘兮，灵台莽其蒺藜。乃踟躇以凝伫兮，切黍离之幽情。召老故而讯之兮，曰文王有囿也。当周姬之大竞兮，方百里以延也；民皆得以为赖兮，物皆得以并育。白鸟翯翯以翔集兮，麋鹿濯濯以攸伏；欣鱼跃之于初兮，郁草木之畅茂。樵苏纷其往来兮，莫不遂其所欲。因名之曰灵囿兮，恐其小而不以为虐也。或一游以一豫兮，为诸侯之度也。春省耕而秋省敛兮，辰搜苗以猕狩也；诘兵戎以练卒徒兮，扬国家之威武也。使悦服而畏怀兮，天下其孰敢侮也？惟文王之圣德兮，何徽柔而懿恭；日中昃以靡遑兮，即康功而田功。卑衣服以恤民兮，以庶邦惟正之供。匪游田之是好兮，羌欢乐与民同。彼多欲之辰君兮，徒虚美之薰心。开上林之苑囿兮，逞羽猎以从禽；杀鸟兽与杀人同兮，恣一己之荒淫。百姓见羽旄之盛美兮，皆蹙额而伤心。其视文王之兹囿兮，何啻乎风铄与黄金？嗟寥寥之千载兮，邈遗躅兮能寻。苟能行不忍之王政兮，施惠鲜之至仁；操王心之翼翼兮，秉文德之至纯。开八百之丕图兮，膺景命之维新。鳧鹭乐其太平兮，行苇及其民淳。薄海隅之丕冒兮，囿万物于一春。谅天意之有在兮，深有望于当今圣人。

赋的结尾借古讽今，劝谏当朝君主厉行王政，表露出士人对帝王的期望及其政治理想，展现了儒家仁政思想与越南士大夫政治关怀的独特结合。将中国辞赋“曲终奏雅”的传统运用开来，充分其政治功能，是越南汉文赋一个重要的特点。

后黎朝另一位赋家邓宣作《松柏后彫赋》，题目来源自《论语·子罕》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的典故。松柏乃众木之宗，即便在恶劣的天气环境中也不显脆弱，反而愈状弥雄，象征着儒家思想中君子的德行：“此圣人所以取喻君子之德，遭事变而益见其忠也”。赋中论证松柏与君子之间相呼应的一段云：

至若，蓐收解卯，玄冥振威；寒风凛冽，百卉具腓。村前院后，山巅水涯；群山童兮尽洗，万汇殒兮不支。惟彼特立，不蔽不亏；郁郁莽莽，淋淋纚纚。并孔桧以流芳奕叶，鄙庄椿之拥肿怪奇。此见松柏之盛，而众木之鲜俨；犹君子之德，岂众人之足希也！

嗟夫！两间赋质，有浊有清。人有人中之异，物有物中之灵。不有物，不足以见松柏之茂；不有松柏，不足以表君子之贞。彼其春夏之交，明媚鲜妍；万物荣茂，孰辨愚贤？何有疵之可指，何有美之可言？及其岁暮天寒，万物彫残；然后表松柏之操，有彼此之观。亦犹人也，文明盛世，太平致治；进退以旅，官任以备。君子小人，孰得拟议？运丁润季，人心殄瘁；然后着君子之风，有善恶之异。此松柏因后彫而得名，若君子因困穷而见义也。

借用《礼记·月令》中秋神蓐收和冬神玄冥来描绘秋冬交替之际，化用《小雅·四月》“秋日凄凄，百卉具腓”诗句来强调万物凋零之状，铺陈出一个严冬的景象。在如此极端的天气中，松柏仍然离离矗矗，众木无法与之比拟，犹如君子之德在任何环境中皆始终不变，而众人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赋文以儒家“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的核心价值观论断君子的真德。在万物荣茂的季节中，松柏与其他树木都处于一样的状态，难以分辨孰疵孰美。只有到了寒冷的冬天，松柏的节操才在彫残的众木之中凸显出来。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治世中小人与君子无异，只有在国家、社会失序衰微之时，真正坚贞的君子才会显现。作者通过此赋表达仰望圣教的心态，抒发个人的道德修养及政治抱负。全赋语言朴素，少有奇字异词，易懂可读。《群贤赋集》¹对此赋的批点为：“此赋虽未为美，然词理具当，亦可谓有志节之士。”（黄萃夫）

越南辞赋取材于史，其善者可举陈代史希颜的《斩蛇剑赋》，取材自《史记》汉高祖斩蛇的故事。此赋以问答为体，讲述秦朝末世刘邦起义的故事作为铺陈，突出全篇主角——斩蛇剑。“赋者”提及吴越的吴钩、巨阙诸名剑，为斩蛇剑衬托，突出高祖此剑更胜一筹。再而化用吴王干将、莫邪二剑不遇英主神君，犹如龙泉、太阿宝剑之埋韬于丰狱、龙津的双重典故，大力颂扬斩蛇之剑。按照题名，赋文到此应该可以结尾了，但作者又让“客”出现而难“赋者”，突出全篇的真正意旨：

赋未毕，客难之曰：“生文明之时者，不谈威武之功；登雍熙之朝者，不言战伐之事。厥今圣朝，升平极治。混四海于一家，同车书于文轨。包干戈以虎皮，销锋镝为农器。和气盎乎九州，仁风薰乎两际。子方翱翔凤仪之庭，舞蹈奏韶之地。反一而之，区区骋雕虫之末技，称杂伯之迹，昧帝王之懿。奚辰务之不通，为有识之所鄙。”

赋者喜而歌曰：“剑乎！剑乎！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诚非所贵。猗欤圣朝，崇文盛世。天下一统兮，安然无事；纵有是剑兮，将焉用彼。”

此赋的结构对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和东方朔《答客难》有所继承、借鉴。“客”与“赋者”的对话中，融合了儒家王道思想和越南本土的和平心态，贬低武力征伐，宣扬文治太平。这种思想和心态就是越南人心里想法的写实，是一个历经战伐的民族对和平的渴望。

¹《群贤赋集》是越南现存最早的汉文赋总集，收录从陈至黎初历代汉文赋作，供业举者研习。由黄萃夫（1414-？）编成于黎仁宗延宁四年（1457），黎裕宗保泰九年（1728）重刻并略有补充。

后黎朝程文徽有《肥水赋》，以东晋时期淝水之战为背景，颂扬晋室将领谢玄的忠勇与谋略，同时反思兴亡教训与政治得失。开篇对历史事件进行诠释，描绘五胡乱华后的乱世，东晋政权偏安江东，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前秦苻坚骄傲自大，“谓投鞭可以塞长江之险，谓独断可以决成败之几”，无视谋士王猛劝谏，率百万大军南侵。谢玄临危受命，率晋军以少敌众，通过智谋与气势击溃前秦军队。中间一段写作者对历史名战的感慨，明显有模仿苏轼《前赤壁赋》的痕迹：

予尝抵掌昔辰，泛舟月夕。纵山水之奇观，访当辰之遗迹；睹风景之微茫，顾山河而啧啧。但见芦花拂岸，形谢玄之进兵；野鸟悲啼，怅秦兵之陷溺。荧光照其羁魂，怒涛激于乱石。感往事之如斯，慨兴亡之畴昔。予于是既以为司马氏之贺，又以为司马氏之惜也。

从“既以为司马氏之贺，又以为司马氏之惜也”展开议论，认为谢玄本已把胜利掌握在手里，只要进一步攻打关中就可以夺回江山。可惜晋室君臣懦弱，毫无励精图治之志，但徒苟安于江东，最终错过统一的机会。所以，“败秦者秦也，非晋兵之能屈；弱晋者晋也，非天下之不从”。曲终奏雅，赋文从司马政权的故事转而颂扬黎朝太祖，虽与晋室的开端相同，然结局却相反。因为太祖有骚敌雪耻之心，能乘胜而攻，最后成功恢复西越江河，结束二十来年烟火。

自陈朝开始固定以儒学为核心的科举制度，到黎、莫、阮历朝对儒术的崇尚，儒家思想已经成为越南封建社会的主导学说。赋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有铺张的体制、宏大的规模，是船载儒家学说的最佳载体。不仅朝廷模仿中华制度以赋取士，文人也自觉用赋来表达儒学价值观。借鉴中华经史，融入本土因素，对儒家学说进行再次阐述，体现越南士大夫经世致用的创作理念，是越南汉文赋的一大特征。这类作品在越南辞赋库中占很大的比率，可谓越南赋史的主流。本文不一一罗列，但举善者如上。可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对越南文化的影响有多深刻。

三、国家自强：本国民族精神的突出

凸显民族精神是越南汉文赋的另一特点。辞赋源于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多种渠道流传至越南，成为越南文学的一部分。越南人虽借鉴中国这一文学体裁，却不让其淹没自己的民族特色，反而运用赋来彰显民族精神。越南辞赋与中国辞赋呈“相反相承”的关系。

纵观越南历史，可以看出这是一片战争连绵的土地。自从五代末期自立为国开始，越南人民就一直面临来自外强的威胁。长期经历战争，使得越南人非常珍惜和平和独立。越南是从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独立出来的，历代封建王朝皆努力靠着民族团结的力量，巩固自己国家的独立地位，与中华朝廷抗衡。这两种心态相融合并升华为爱国主义，经历李、陈、黎时期的多场抗敌战争之后，更是成了文学创作的主导精神。被誉为越南第一篇独立宣言，是李朝时期李常杰在抗宋战争前线上写的千古名诗《南国山河》：

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

如何逆虜来侵犯，汝等行看取败虚。（于在照，2014, p. 38）。

陈朝时期越南面对蒙元铁骑的三次南侵，陈国俊写了《谕诸裨将檄文》，唤起诸军杀敌雪耻的精神，高歌将家保家卫国的决心：

……况余与汝等生于扰攘之秋，长于艰难之势。窃见伪使往来道途旁午。掉鸱乌之寸舌而陵辱朝廷，委犬羊之尺躯而倨傲宰制。托忽必列之令而索玉帛以事无已之诛求，假云南王之号而拏金银以竭有限之饶庠。譬犹以肉投馁虎宁能免遗后患也哉？余常临餐忘食，中夜抚枕，涕泗交痕，心腹如捣。常以未能食肉寝皮，絮肝饮血为恨也。虽余之百身，高于草野，余之千尸，裹于马革，亦愿为之！……汝等坐视主辱曾不为忧，身当国耻曾不为愧。为邦国之将侍立夷宿而无忿心，听太常之乐宴飨伪使而无怒色。或斗鸡以为乐，或赌博以为娱。或事田园以养其家，或恋妻子以私于己。修生产之业而忘军国之务，恣田猎之游而怠攻守之习。或甘美酒，或嗜淫声。脱有蒙鞞之寇来，雄鸡之距不足以穿虏甲，赌博之术不足以施军谋。田园之富不足以赎千金之躯，妻孥之累不足以充军国之用。生产之多不足以购虏首，猎犬之力不足以驱贼众。美酒不足以沈虏军，淫声不足以聋虏耳。……今余明告汝等，当以措火积薪为危，当以惩羹吹釜为戒。训练士卒习尔弓矢。使人人逢蒙，家家后羿。购必烈之头于阙下，朽云南之肉于杲街。不唯余之采邑永为青毡，而汝等之俸禄亦终身之受赐；不唯余之家小得安床褥，而汝等之妻孥亦百年之佳老；不唯余之宗庙万世享祀，而汝等之祖父亦春秋之血食；不唯余之今生得志，而汝等百世之下芳名不朽；不唯余之美溢永垂，而汝等之姓名亦遗芳于青史矣。……（吴士连，2015, pp. 318-320）。

黎利领导蓝山义军成功驱逐明军，结束郡县时期，夺回西越江山。为了宣告新政权的成立以及国家的独立，黎太祖命阮廌拟自己的口吻写下被称为越南第二篇独立宣言的《平吴大诰》：

盖闻：仁义之举，要在安民；吊伐之师，莫先去暴。惟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常乏。……顷因胡政之烦苛，致使人心之怨判。狂明伺隙，因以毒我民；恶党怀奸，竟以卖我国。焮苍生于虐焰，陷赤子于祸坑。欺天罔民，诡计盖千万状；连兵结衅，稔恶殆二十年。败义伤仁，乾坤几乎欲息；重科厚敛，山泽靡有孑遗。开金场塞冒岚瘴而斧山淘沙，采明珠则触蛟龙而縊腰余海。扰民设玄鹿之陷阱，殄物织翠禽之网罗。昆虫草木皆不得以遂其生，鰥寡颠连具不获以安其所。……神人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予奋迹蓝山，栖身荒野，念世讐岂可共戴，誓逆贼难与具生。……予以全军为上，而欲民与息。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所未见闻。社稷以之奠安，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于以开万世太平之基，于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阴佑而致然也。……（吴士连，2015, pp. 493-496）。

以上三篇作品，表明了带有民族特色的爱国主义渗透到以外国文字为载体的汉文学中的依据。要知道，社会背景与文学创作有着亲密的关系，社会背景在文学创作中扮演着支配的角色。“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社会对文学的观念从写作目的到题材范围、文体形式等方面皆深刻影响到文学实践。”（Đình Gia Khánh, 2015, p. 24）越南文人受社会背景的影响，将民族精神投影到文学作品中，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特点不限于诗文，在辞赋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国家安危受到威胁、民族精神得到激发的陈黎时期的作品。

最能体现越南民族特色的题材是咏史赋，通过对战争的叙事、铺陈，有时候唱扬越南人民在乱世中的英勇精神，有时候赞颂拯溺救焚的豪雄君主。这些作品虽然来自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之手，但共同点在于大多都以山水为名，不是为了写景，而是让在那些地点发生过的历史战役在白纸上重演，时时刻刻提醒后人牢记民族的遭遇以及先祖的英雄气概。

写川河者，代表可举陈朝张汉超的《白藤江赋》和后黎朝李子晋的《昌江赋》。张赋歌唱越人三次在白藤江上打败侵略者的战功（五代时吴权败南汉军、前黎大行皇帝败宋军、陈室名将陈国俊败元军），主要是赞扬陈室君民的显赫战绩。此赋在写法上设主客问答，写客者夜间泛舟、触景怀旧，江上偶遇父老、水月和歌，多有借鉴《前赤壁赋》之处。如赋中写客者夜中游泳，观看白藤江的险要水势，感慨一代豪杰一段曰：

乃举楫兮中流，纵子长之远游。涉大滩口，溯东潮头，抵白藤江。是泛是浮，接鲸波于无际，蘸繇尾之相缪。水天一色，风景三秋。渚获岸芦，瑟瑟飕飕。折戟沉江，枯骨盈丘。惨然不乐，伫立凝眸。念豪杰之已往，叹踪迹之空留。

与苏赋不同的是，《赤壁》是通过对兴亡变迁的感慨阐说人生哲理，《白藤》则是单纯为圣主强民表达由衷的自豪感。赋中“父老”为“客”讲述白藤江的故事，借鉴了大量与白藤江之战同样显耀的中国著名战役，如西周盟津之会、西汉潍水之战、三国赤壁、东晋淝水，为赋增添恢宏的气势：

当期，舳舻千里，旌旗旖旎。貔貅六军，兵刃蜂起；雌雄未决，南北对垒。日月昏兮无光，天地凛兮将毁。彼必烈之势强，刘龚之计诡，自谓投鞭可扫南纪。既而皇天助顺，凶徒披靡。孟德赤壁之师谈笑飞灰，苻坚合肥之阵须臾送死。至今江流，终不雪耻。再造之功，千古称美。虽然，自有宇宙，故有江山。信天堑之设险，赖人杰以奠安。孟津之会鹰扬箬吕，潍水之战国士如韩。惟此江之大捷，犹大王之贼闲。英风可想，口碑不刊。

篇末将儒家武德观念融入战争叙事，将白藤江战绩升华为不在关河之险要，而在君人之懿德：“二圣兮并明，就此江兮洗甲兵。胡尘不敢动兮，千古升平。信知不在关河之险兮，惟在懿德之莫京。”

白藤江是陈室打败蒙元铁军之地，昌江则是明越战争中最重要战场之一。明人在交趾多次失利，明宣宗图挽回局面，遣柳升等领兵前来救援。昌江为蓝山军破柳升之地，此战轰动一时，促进了起义的成功。李子晋写《昌江赋》，虽对张赋有所继承，但使用了完全不同的叙事手法。赋文遵循骈赋先铺张而后归美的传统套路，除去个人情怀，写赋如写史，用旁观的视角歌颂民族英雄黎太祖。赋中用充满戏剧性的方式，分别给予黎利和柳升等人正派和反派的角，使两者的命运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对照：

于是，神助睿算，天佑宽仁。戒我将士，整我六军；以遏徂旅，以卫生民。金鼓一鸣，而貔貅之众气增十倍；义旗所指，而熊黑之旅奋不顾身。坡垒鸡棱，威生草木；平滩弄眼，势卷风云。焱霆驱而电扫，妙出奇而入神。贼酋计穷而褫魄，凶徒风解而奔星。

尔乃，矜崔聚，斩柳升，李庆送死，黄福就绑。维倒戈以躡辘，卒逐北而奔崩。血流者满坑而满谷，尸僵者如山而如陵。四塞绝纤埃之氛翳，中天揭日月之升恒。彼合肥之风声鹤唳，蜀足以喻其捷；赤壁之斤帆不返，奚足以参其能也哉！

崔聚、柳升、李庆是明帝派往交趾的将领，另外还有尚书黄福，他们在此战中都有悲惨的结局。明军刚进入交趾关内时，被埋伏于支棱关（今属谅山省）的黎利军队大破，柳升、李庆阵亡。崔聚、黄福强进至昌江，向东关城（今河内市）的明军求援，东关自顾不暇，无法应援。崔、黄便诈求和，黎利不许，率军破之，生擒崔聚、黄福。这段将此历史故事搬上文字的舞台，使之得以艺术化。此赋继承《白藤江赋》的地方在篇末：

嗟夫！功因德大，地以人灵。固国不在山谿之险，保民不在百万之兵。谅天上之眷佑，匪人谋之敢争。故兹江不遇圣祖，乌能成天险之美；不因战胜，乌以彰地利之名。是知民之怀于有德，天之辅于克诚者也！

地灵人杰是越南咏史赋中常见的事项。地因人而成名，地虽险而不遇圣君，亦不能造就战功、垂名青史。这是越南士大夫看待战争成败的价值观，以人为重，而人之重在于德。

写山岳的越南赋，其善者可举李子晋、阮梦荀、阮廌、陈舜俞四人尊黎太祖之命创作的御题《至灵山赋》。至灵山（今属清化省）是抗明起义中又一个重要的地方，蓝山被围后黎利屯兵于此地。至灵山有着极为险要的地势，为起义的成功贡献了很大，其历史意义对黎室君臣来说仅次于圣地蓝山。新朝廷成立后，黎太祖以山名为题，令诸文臣赋而颂之。四篇赋节遵循地灵人杰的传统观念，比喻至灵山对于黎利就像会稽对于勾践、芒砀对于刘邦一样重要，但同时又指出其内部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此四篇中陈舜俞之作为最佳。

陈赋设主客问答，一共出现三个人物：客、父老、叟。“客”者游览天下，访过勾践故墟、炎刘旧疆，再而来到西越至灵此山，揖“父老”而问其事。“父老”为其讲述三者的故事曰：

思昔，夫差逞凶，会稽保踪。范种之行成已许，西施之艳色方浓。既焦心而苦思，雪耻以图终。卧薪尝胆，吊死账穷。每折节以下贤，常躬耕以训农。期生长之升平，羌穷苦之与同。及其属镂飞光，二队济江；吴国为沼，姑苏就荒。会诸侯于徐州，致赐胙于天王；任专征于方伯，成伯业之益昌。岂非会稽复讎之事，愈久而愈芳者乎？

至若，长城血腥，鹿走咸京。提三尺兮一奋，泣中夜兮素灵。入芒砀之查蒿，敛光彩于榛荆；忽祥云之缥缈，舒五彩于岩扃。蔓不知其所在，羌忧患之相萦。及其揽三杰，屈群策；定三秦，收图籍。齐魏瞥尔而一空，燕赵靡然而就戮。飞垓下之游魂，殒乌江之惊魄；加四海之雄威，基炎祚之四百。岂非芒砀之事，永有光于简册者乎？

若夫，胡马南牧，臆羯吐毒。庸主逆天而速祸，奸臣举国而求鬻。故宫兴离黍之悲，周道叹茂草之鞠。贼情棋布而星罗，虐守狼吞而虎攫。泽竭山童，赋重刑酷。搜金采玉，穷民苦山寿、马骐之老饕；断脰剖肠，遗黎痛张辅、方政之荼毒。及其辰当天定，西土启圣；栖迹兹山，遵晦俟命。取任尽下士之诚，事大竭畏天之敬。奈狂寇之并吞，而苦焰之方盛。流离相失，愈于长坂之艰危；饥困无聊，甚于滹沱之徽幸。幡神龙于查冥，沕渊潜而未奋。猿猱啾啾兮声哀，松柏萧萧兮风迎。巍石笼篴以槎牙，霜泉凜冽而奔迸。顾左右其无人，缈风尘之幽忧。虽困心衡虑，而不怵于大艰；虽迅雷风烈，而不改其常性。既而豪杰影从，神灵助顺；闋毖成功，顺天启运。……歼不戴之大讎，

雪无穷之深恨。西戎由是而是完，北虜于焉而殄愠。武功大成，丕然无竞。周原禹甸，疆理经营；四海九州，讴歌朝覲。

于是，兹山之势，日以益大。昔之荆棘榛芜，今则柞械拔，而行道兑而西夷駸。兹山之势，日以益崇。昔之偏僻幽遐，今则自西自东，咸率众而四海同。兹山之名，久而益芳。昔之山林险阻，今则有周行，居久臧而帝业康。以此观之，则兹山与会稽、芒碭，同一肇基，同一兴王也。

“父老”认为至灵山可与会稽、芒碭颀颀，而黎太祖的功业可与越王、汉高相提并论。但作者的目的是将本国君主推上更胜一筹的地位，所以“父老”之言只是为歌功颂德的部分衬托，于是又出现一“叟”难之曰：

子之言，何其迂若是？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徒见兹山之象，与会稽、芒碭虽同；而不知我皇之德，与勾践、高祖则异。彼二君者，听天与不取之言，而甘其残忍；用养虎遗患之策，而至于不义。曷若夫我皇，量同天地。大德好生，心唐虞之心以为心；神武不杀，志汤武之志以为志。支棱数十万之俘虏，有如笼鸟之哀鸣；东关十二城之逆讎，何异鼎鱼之乱沸？一旦放回，大开生路。弘恢汤网之仁，大荫尧天之庇。扇万国之仁风，播八荒之和气。泽厚仁深，化行俗美。等天作之岐山，同贻谋之丰芑。兹山之寿，天子万年；兹山之茂，本支百世。固有永之皇图，崇不拔之基址。彼汉越之二山，曾何足以比伦而拟议也哉？

这段引用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范蠡对越王说“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劝其不能赦罪吴王以及《项羽本纪》中张良、陈平说放走项羽是“养虎自遗患”的典故，结合越史中黎太祖放回十万战俘、劝降十二城池的故事，认为越王、汉高虽成就大业，但手段过于残忍不义，惟黎祖以德服人，其“量同天地”，兼具“唐虞之心”与“汤武之志”。这种对比，实则是将越南君主置于中国圣王谱系中，并宣称其德行已超越那些著名的中原开国君主，表达越南人“抗衡中华”的本土政治自信。从此赋的总体结构及行文风格来看，隐约可以看出司马相如《上林赋》的雏形。

当代越南学者认为，多位作家尊帝王之命同时创作《至灵山赋》体现了十五世纪上半叶越南文坛上的集体性创作活动（Đình Gia Khánh, 2015, p. 211），笔者则不赞同这一说法。在越南甚至中国文学史上，“御题”并不是罕见的现象，如胡朝时期有人献一只形状似马的用叶子编成的虫子，朝廷以为祥瑞之兆，故名之曰“叶马儿”，遂以之为题，令士大夫赋之以颂。今存《叶马儿赋》者有段春雷与阮飞卿二人之作，但胡朝这个御题并没有被冠上“集体性”的美名。说某个应帝命而作的创作活动具有集体性是没有依据的。而且，编纂《越南文学》这部书的越南学者们是用带有滤镜的眼光看待胡朝与黎朝的，他们从儒家的观点，认为胡季犛是篡陈大贼，黎利则是国家英雄，《叶马儿赋》是谄佞奸者之言，《至灵山赋》则是赞颂豪杰之歌，从理论上就存在偏见的看法，所以此说法不能成立。

越南人“借鉴中国，书写自我”，创作载有爱国主义的辞赋作品，时不时渗入儒家学术的王政、仁道等思想。咏史赋不仅是高歌本国英雄、向中华朝廷宣称自己独立地位的合法性的工具，同时也是体现越南人从唐宋时代继承到的“文以载道”思想的渠道。这是越南汉文赋的第三大特点。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Nguyen Huu Tho ^{ID} <https://orcid.org/0009-0001-0190-7873>

Liu Pe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2-8130-8746>

References

撰人不详：《越史略》，王云五主编（民国 25 年）。商务印书馆。

[Anonymous. *Viet su luoc*, edited by Wang Yunwu (25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mmercial Press.]

高春育等：《国朝乡科录》。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本，编号 R.5849、R.5851。

[Cao Xuan Duc et al. *Quoc trieu huong khoa luc*.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Vietnam, Nos. R.5849, R.5851.]

丁嘉庆（2015）：《越南文学：从 10 世纪至 18 世纪上半叶》。越南教育出版社。

[Dinh Gia Khanh (2015). *Vietnamese Literature (10th Century – First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Vietnam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黄萃夫：《群贤赋集》。汉喃研究院藏本，编号 A.575。

[Hoang Tuy Phu. *Quan hien phu tap*.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Han-Nom Studies, No. A.575.]

黎明国（2004）：《越南改革家》（第二册）。青年出版社。

[Le Minh Quoc (2004). *Vietnamese Reformers (Volume 2)*. Youth Publishing House.]

刘春银、王小盾、陈义（2002）：《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湾省“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Liu Chunyin, Wang Xiaodun, Chen Yi (2002).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Vietnamese Han-Nom Literature*. Taiwan provinc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梁氏海云（2024）：《越南汉词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Luong Thi Hai Van (2024).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of Sino-Vietnamese vocabula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吴士连等（2015）：《大越史记全书》，孙晓主编标点校勘。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Ngo Si Lien et al. (2015). *Dai Viet su ky toan thu*, punctuated and collated by Sun Xiao (Ed.).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范廷琥：《群书参考》。汉喃研究院藏本，编号 A.487。

[Pham Dinh Ho. *Quan thu tham khao*.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Han-Nom Studies, No. A.487.]

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汉喃研究院藏本，编号 A.50/3。

[Phan Huy Chu. *Lich trieu hien chuong loai chi*.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Han-Nom Studies, No. A.50/3.]

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本，编号 R.544。

[Phan Thanh Gian et al. *Kham dinh Viet su Thong giam cuong muc*.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Vietnam, No. R.544.]

宋濂等（1976）：《元史》，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

[Song Lian et al. (1976). *Yuan Shi*, punctuated and collat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Zhonghua Shuju. Zhonghua Shuju.]

孙福轩（2011）：“中国科举制度的南传与越南辞赋创作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1）：150-160。

[Sun Fuxuan (2011). “The Southward Transmission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Creation of Vietnamese Cifu.”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01): 150-160.]

陈义（2000）：《10世纪以前越南人汉文作品的搜集与考论》。世界出版社。

[Tran Nghia (2000). *Collec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Han-Character Works by Vietnamese People Before the 10th Century*. World Publishing House.]

脱脱等（1985）：《宋史》，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

[Tuotuo et al. (1985). *Song Shi*, punctuated and collat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Zhonghua Shuju. Zhonghua Shuju.]

武钦璘：《古今科试通考》。汉喃研究院藏本，编号 VHv.1297。

[Vu Kham Tan. *Co kim khoa thi thong khao*.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Han-Nom Studies, No. VHv.1297.]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1977）：《越南历史》第一集，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人民出版社。

[Vietnam Committee of Social Sciences (1977). *History of Vietnam (Volume 1)*, translated by the Vietname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谢桃坊（2021）：《中国词学史》（补订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Xie Taofang (2021). *History of Chinese Ci-Poetry Studies (Revised Edition)*.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徐松（1984）：《登科记考》，赵守俨点校。中华书局。

[Xu Song (1984). *Dengke Ji Kao*, punctuated and collated by Zhao Shouyan. Zhonghua Shuju.]

于在照（2014）：《越南文学史》。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Yu Zaizhao (2014). *History of Vietnamese Literature*. World Publishing Guangdong Co., Ltd.]

张伯伟（2024）：“东亚辞赋文献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域外汉籍研究集刊》（02）：135-152。

[Zhang Bowei (2024).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ollation of East Asian Cifu Literature." *Bulletin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Overseas* (02): 135-152.]

张廷玉等（1974）：《明史》，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

[Zhang Tingyu et al. (1974). *Ming Shi*, punctuated and collat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Zhonghua Shuju. Zhonghua Shuju.]

郑永常（1987）：《汉文学在安南的兴替》。台湾省商务印书馆。

[Zheng Yongchang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Han Literature in Annam*. Taiwan province Commercial Press.]

踪凡、郭英德（2017）：《历代赋学文献辑刊》第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Zong Fan, Guo Yingde (2017). *Collection of Fu-Poetry Studies Literature of Past Dynasties (Volume 1)*.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